

中韓合作研究張保皋綜論

王莉 李寶民 閔德權

(中國·大連海事大學)

[摘要]本文簡要回顧了近些年來中韓合作研究張保皋的過程，并對這一研究在學術上所取得的某些突破性成果給予評估。

A study about the cooperation on Zhang Baogao by China and Korea

Wang Li Li Baomin Min Dequan

Dalian Maritime University P.R.China

Abstract:

The paper simply review the process about the cooperation on Zhang Baogao by China and Korea in present years, and analysis the results of the papers.

張保皋是 9 世紀活躍于東亞海域的新羅大海商。在中、韓、日三國史料中，雖對他的傳奇人生經歷和海運貿易業績有所記載，但因語焉不詳，故并未引起學界之深究。直至 20 世紀 80 年代，在以韓國學術界為主之推動下，圍繞張保皋研究才開始啟動，并在中國學者的積極參與和合作下，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的學術成果。

初期的研究成果，是把張保皋人生經歷的幾個主要階段勾勒出來：他出生于朝鮮半島西南海岸莞島地區，早年曾流寓中國江淮地區。由于他武功高強、勇敢善戰，30 歲時與同鄉鄭年一起作了“軍中小將”，后于 828 年回國。回到故鄉不久，覲見新羅王，以保護本國人不被販賣中國為奴婢為由，被獲準任清海鎮“大使”。此后，主要從事新羅與唐的海上貿易，也兼做日本生意。其在中國山東所修建的“赤山法華院”，可能是他開展海外業務的一個變通性的分支機構。張保皋在成為富可敵國的大海商之后，還多次參與爭奪新羅王位的政治斗爭，因扶助神武王上臺有功，被封為“感義軍使”，后又受拜為鎮海將軍，并被“以禮征為上六等”。公元 846 年，他因獻女為文王之妃未果而舉兵造反，同年遭原部將閻長暗殺身亡。

然而，對張保皋的研究僅有這些是不夠的，還有許多問題需要解決。如為什麼早在一千多年前的那樣特殊的歷史年代會出現那樣特殊的歷史人物？張保皋為什麼來中國？這段出國經歷對他有什么影響？其歷史地位如何？等等。當然，對這些問題的研究僅限于在一國範圍內是不行的，需要聯合的力量，合作才能完成。

從 1996 年開始，在韓國航海學會會長、釜山海洋大學許逸教授的倡議和主持下，中國方面的學者也加入到研究張保皋的行例里來。通過歷年來“中韓航海學術交流會”，圍繞以張保皋為代表的“8—9 世紀新羅與唐的海上交往與貿易”這個主題，兩國學者就各自感興趣的問題展開了研究。1998 年，在韓國學術振興財團的“與外國學者的共同研究課題研究費”資助下，由韓國航海學會、韓國

海洋大學和中國大連海事大學合作組成了共同研究課題小組，開展合作研究張保皋的工作。此項研究歷時二年。1999年底，作為中韓合作研究的成果，課題組呈交了“對8—9世紀新羅與唐兩國間的海上活動與貿易研究——張保皋的海上活動為中心”報告，圓滿地完成了任務。

實踐證明，這次合作研究，對於加強中韓兩國學者的相互學習和交流，對於全面和深入研究以張保皋為代表的古代中韓之間的海上貿易與航海交往，都是很有意義的。其主要成績如下：

一、這是一次成功的合作

組成課題組的聯合研究人員主要有韓國海洋大學的許逸教授、崔在洙教授和大連海事大學孫光圻教授、王杰和李寶民副教授，還有山東省蓬萊市文物局的袁曉春副研究館員。

這些專家學者中，既有經驗豐富的航海技術專家，又有享譽國際的航海史專家、航運管理專家，還有很有造詣的青年學者和考古專家，這個由專家學者組成的科研實體，互補性很強，可從不同角度、不同層面對課題進行全面而深入的研究。通過對史料的慎密分析和推理、對文物的調查與考證，從而得出符合實際的正確結論。同時，雙方本着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合作的精神，使最終研究報告成為雙方共同完成和共同認可的優秀學術成果。

二、此課題報告填補了對古代唐與新羅海上交通史研究的空白，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

東亞三國歷史關係源遠流長，極為悠久。古代唐、新羅與倭三國之間政治、經濟和文化交流頻繁，海上交通密切，學術界對中日海上交通史研究成果甚多，但對中韓海上交往史研究相對較少，亟待補闕。

8—9世紀是新羅海運業發展時期，也是以張保皋為代表的新羅人與唐海上交往的繁榮時期。有關的史料，特別是張保皋的資料，雖然在中、韓、日三國文獻中都有記載，但由於時期和地域的限制，都是零散的、混亂的，缺乏完整性和系統性，不利於後人對張保皋個人乃至其所處時代的中韓海上關係史有一個正確的認識。課題組經過不懈的努力，從新羅與唐之間海上活動與貿易背景，以張保皋為代表的新羅人對唐的航海和貿易活動，張保皋時期新羅人對唐與日本的海上交通路線、張保皋船隊及其航海技術等四方面入手，進行了全面、深入、系統的研究。把張保皋不平凡的一生完整的展示給後人，把古代新羅與唐的海上交往與貿易凸現出來，彌足珍貴。

三、此研究報告在以下幾個方面，對張保皋研究有所突破：

1、關於張保皋歷史地位的評價

張保皋是在一千多年前活躍於東亞海域的著名人物，那麼他在國內和國際上的歷史地位是怎樣的？應該如何評價？這是張保皋研究中的重要問題。

課題組在評價張保皋的歷史地位時，將其納入斯時錯綜複雜的國際關係（尤其三國間的關係）和時代特征當中，客觀、辯證地綜合評價。

如研究報告認為“8—9世紀新羅人大規模的開展與中國的海上交往與貿易，有着深刻的歷史背景、政治背景、經濟背景、文化背景和航海背景的”。而張保皋這樣一位重要的歷史人物的出現決非偶然，而是一定社會歷史發展的必然產物，他“是新羅人的一位杰出代表”，其航運成就是“功不可沒、建樹甚豐的”。他“與其所代表的新羅人”“為該時期東亞航海畫卷，繪上了濃鬱絢麗的一道彩虹”。“他的存在與活動正式代表了一種社會力量的存在與活動”，“對改變歷史發展的方向和速度

將產生積極的作用和有力的影響。”

2. 關於張保皋有關史料的利用價值

有關張保皋的史料記載較為分散、零亂，有些甚至是互相轉抄。因而學術價值不高。

經過課題組認真細致的工作，去粗取精的梳理，去偽存真的篩選之后，整理出具有可靠學術價值的直接涉及張保皋的史料，即（1）中國史料：杜牧《樊川文集·張保皋鄭年傳》、歐陽修《新唐書》卷 220。（2）韓國史料：金富軾《三國史記》卷 10、11、44，一然《三國遺事·紀異 2》。（3）日本史料：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行記》、日本的《續日本后紀》。

在此基礎上，課題組通過對史籍的內容分析認為，《樊川文集》與《新唐書》及《三國史記》卷 44 敘述事實相同，后兩本書應為抄自《樊川文集》（因其成書早于其他兩書），而《三國史記》卷 10、11 及其他幾本書所記內容各有所不同，可做為研究依據。

這是一項有意義的工作，可為今后的張保皋研究提供方法論。

3. 關於張保皋入唐在徐州生活狀態記載較為生動、具體。如《樊川文集卷 6·張保皋鄭年傳》載：“新羅人張保皋、鄭年者自其國來徐州為軍中小將，保皋年三十……俱善斗，戰騎而揮槍，其本國與徐州無有能敵者”。

但是，史料對張保皋在徐州活動的具體時間卻缺乏明確的記錄，成為整個研究的難題之一。課題組挖掘了與此有關的三個間接史料，即一是張保皋在徐州時年已 30 歲；二是 828 年時張保皋已歸國擔任清海鎮大使；三是 846 年張保皋被暗殺在家鄉。結合張保皋后來所從事的活動，依照“大膽設想，小心求證”的原則，通過三次逆向推算，推測出“810—828 年間的某一個時期，就是張保皋在徐州活動的大致時間”。此時，其年齡大致是 24—32 歲。

4. 關於張保皋到中國來以及回國的原因

張保皋作為一名驍勇善戰、有軍事作戰能力的特殊人才，為什麼不在祖國最需要的時候為國效勞，反而背井離鄉到中國從軍呢？研究報告分析認為，這與當時發生的兩件大事有關，一是“815 年到 821 年，新羅境內連年饑荒，約有 170 人曾漂海往漸東求食”。二是 819 年唐青州節度使叛亂，憲宗欲調遣揚州節度使征新羅兵討伐。張保皋正是此時或逃荒，或是被征兵才來到唐朝徐州并任武寧軍中小將。

張保皋作為一名外國人，能夠在中國“地重而兵勁”的徐州擔任一定軍職，可謂頗受重視，前程遠大。可后果為什麼他又在正值壯年，事業剛剛起步的時候又匆匆回國呢？報告通過對唐代史料的仔細分析，推斷這可能與當時武寧軍最高長官王智興有關。王智興是個“為政苛酷”，心胸狹窄、嫉賢妒能之人，早年可能與張保皋共過事。但他在通過兵變，迫使朝廷任命他為武寧軍節度使之后，卻對“勇敢、愛士卒”的屬將石勇進行迫害和打擊。而武藝高超、“愛壯士，無所猜疑”且身為外國人的張保皋自然也免不了要受到壓制和排擠。從張保皋歸國后，鄭年也“錯寞去職，饑寒在泗之漣水縣”的遭遇看，二人很可能也因受到排擠而退出武寧軍，張保皋或恐就此返歸新羅，另謀發展了。

5. 關於張保皋在武寧軍所任“小將”之職及這段經歷對其后來的影響。

史料記載的張保皋所任武寧（或為徐州）“軍中小將”是個什麼職務？它在唐兵制中的地位如何？這也是需要解決的重要研究課題。

研究報告認為，文獻中所提的“武寧軍”、“徐州軍”都是指以徐州為中心的同一個藩鎮。而在唐藩鎮的軍隊編制中並無“小將”之職，只有在唐中央直屬軍隊中存在，“職級甚卑”，類似于“小校”、“牙校”。因當時“牙校”口碑很差，杜牧又很推崇張保皋，自然用“小將”代稱之，這似乎有隱喻成份。“牙兵”和“牙校”并非一般普通士兵，而具有特殊身份的親衛兵。

張保皋所供職的徐州軍在唐代中后期十分有名，人稱“武寧士卒素驕”。而此時，唐各地藩鎮內部曾頻頻發生兵變。徐州兵在 830 年前就發生過 3 次兵變。這種行為具有濃厚的“士卒得以凌偏裨，偏裨得以凌將帥”的凌上性特色。諒必身處此種環境的張保皋會倍受感染，其歸國后，曾在 838 年、846 年兩次用兵新羅王室，這種以下犯上的做法，可謂受在唐從軍時的潛移默化影響所致。

6. 關於張保皋船隊的船型及航海技術

張保皋長期從事唐、新羅、倭三國的三角貿易。其船隊一定具有相當的規模和較高的技術水平。

那么張保皋船隊所用之“交關船”又是怎樣的呢？課題組認為，張保皋一定會對當時周邊國家造船水平、技術性能了如指掌。中國的造船和航運水平最高，他在中國東郊沿海留居多年，熟悉情況。因此，他諒必會使用中式船舶，而其船型亦原為中國北方海區習見的沙船。在船體結構上有扁龍骨、大、水密隔艙、船樓、採用了釘樁結合和黏縫技術。在屬具裝備上，有多桅（可能有三桅）、錨、舵、拔水板和太平籃等。

同時，張保皋船隊也可能借鑒了中國先進的航海技術。如在中國東南沿岸、朝鮮半島以及穿越朝鮮海峽的航行中，主要依靠觀測陸標等地文技術作為導航與定位技術。而在跨越黃海的橫渡航行中，則運用了天文導航和打偏使風技術。據此，課題報告認為張保皋船隊當時造船水平和航海技術，“應可達到東亞一流水準”。

綜上所述，應該說整個合作研究是相當成功的。但也有一定的不足之處如對第保皋姓名的考釋仍有留憾之處。課題報告稱：中國史料稱之為“張保皋”，日本史料均作“張保高”（漢字中“皋”通“高”），惟韓國史料均以“弓”為其姓。但該國所稱之“弓福”、“弓進”何以見得就是張保皋（高）？在這方面，研究報告中缺乏必要的解釋，不免令人心生疑竇，相信這一問題以及其他一些有待繼續深究的問題，會在今后的研究中找到令人信服答案。